

【沖縄大学】  
【Okinawa University】

Title	粤北山区瑶族的搬迁与适应
Author(s)	马, 建钊; 陈, 晓毅
Citation	地域研究 = Regional Studies(2): 29-45
Issue Date	2006-03-31
URL	<a href="http://okinawa-repo.lib.u-ryukyu.ac.jp/handle/okinawa/5541">http://okinawa-repo.lib.u-ryukyu.ac.jp/handle/okinawa/5541</a>
Rights	沖縄大学地域研究所



# 粤北山区瑶族的搬迁与适应

马建钊\*·陈晓毅\*\*

On the Resettlement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of Yao People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North Guangdong

Ma Jianzhao and Chen Xiaoyi

本文研究粤北山区瑶族的移民搬迁及其文化适应。文章首先描述了粤北山区瑶族搬迁基本情况,然后对粤北瑶族搬迁的动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解析。作者认为除了工程原因之外,主要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生态原因导致粤北山区瑶族的移民搬迁。在粤北瑶族典型移民村和大量访谈资料的基础上,文章从物质、社会、精神等三个层面全面分析了山区瑶族移民在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面的适应情况。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因各种不同原因而迁移的瑶胞的文化适应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力图提供可能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 粤北山区 瑶族 迁移 文化适应

**Key words:** Resettlement cultural adaptation, Yao nationality, Mountainous area of North Guangdong

- 1. 引言
- 2. 粤北瑶族移民搬迁的基本情况
- 3. 粤北瑶族移民搬迁的原因探析
  - 3. 1 政治原因
  - 3. 2 经济原因
  - 3. 3 生态原因
- 4. 粤北瑶族移民搬迁的文化适应
  - 4. 1 物质层面
    - 4. 1. 1 生计模式
    - 4. 1. 2 生活方式
  - 4. 2 社会层面
  - 4. 3 精神层面
    - 4. 3. 1 思想观念
    - 4. 3. 2 宗教信仰
- 5. 结论与思考

## 1. 引言

“粤北”即指广东北部,主要包括清远市和韶关市。该地域群山连绵,是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除了一些盆地和切谷之外,当地的海拔一般在1000—1500米。广东省最高峰石坑崆,海拔1902米,就是坐落在这个区域。广东省的“世居瑶族”<sup>(1)</sup>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区域。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广东的瑶族有202667人<sup>(2)</sup>,这个数字包括外来瑶族和广东省的世居瑶族。广东省的

世居瑶族主要分布在连南瑶族自治县、乳源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及散居在连州、始兴、曲江、阳山、翁源、仁化、乐昌、怀集、阳春、英德、龙门等10多个市县境内。其中,连南有近8万瑶族人口,乳源有2万多瑶族人口,连山有近万瑶族人口,因此可以说,除了珠三角城市大量的外来瑶族人口之外,三个自治县的瑶族人口占了广东省世居瑶族的绝大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各地经济出现较大的发展差距。生活在粤北山区中的贫困瑶族,90年代到现在出现了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移民搬迁浪潮。有些是在经济的推力和拉力的综合作用之下自愿搬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些则在政府的引导和资助下、在慈善团体的帮助下走出了生活难以维继的贫困山区。从1993年5月11日广东省清远市委、市政府在英德市召开“第一次石灰岩特困地区人口迁移会议”时起,清远市在近5年的时间里,有计划地组织了18万石灰岩特困地区和高寒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户的人口迁移,这是岭南地区自近代以来最具规模的大移民,而移民们则将特困地区人口大迁移这项宏大的扶贫行动称之为“第二次解放”(潘伟1998“题记”)。据保守估计,改革开放后粤北瑶族的移民人口至少有4万余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乡土,他们搬迁之后的适应状况怎样,学术界至今尚无全面而深刻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粤北山区瑶族移民搬迁的情况、迁移原因和文化

\*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510180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米市路58号中心楼, mjzh88@21cn.com

\*\*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 chenxiaoyi8@yahoo.com.cn

适应状况等方面做一个综观性的描述和思考，以期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除了文后罗列的参考文献外，本文资料都是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得来。笔者运用人类学的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先后三次专程到粤北做专题调查：2004年12月调查了连南三江镇塘冲村的高岭自然村和连山小三江镇的立星村委会；2005年3月调查了始兴县沈所镇上围溪瑶族村和乳源东坪镇东莞商会民族村、茶亭瑶族村；2005年8月调查了连南的牛塘林场、大麦山镇的扶轮新村以及连山的福堂镇福民新村。调查过程中，我们先后深入访谈了这些地方的瑶族移民20余人，另外还访谈了各个县民族宗教局、移民办、扶贫办等相关干部10多人。另外，笔者平时多次针对粤北瑶族其他专题的调查中也收集了一些涉及瑶族移民的情况，本文有时也使用了那些已有的材料。

## 2. 粤北瑶族移民的基本情况

由于历史原因，连南、连山、乳源三个自治县和一些粤北地区的民族乡的瑶族群众大多聚居在石灰岩地区和高寒山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较差。三个自治县和一些民族乡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先后曾采取了各种扶持措施，投入大量资金和物资帮助贫困少数民族改变生活处境，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当地瑶族群众仍属于全省比较贫穷的群体。1993—1996年广东省政府先后共投入资金9281.45万元，对聚居在石灰岩地区和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较大规模地移民搬迁。自1993年5月起，清远市组织实施了石灰岩山区特困人口和高寒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大迁移，走农业异地开发路子，大容量快速解决农村特困人口温饱问题。全市共投入各类迁移资金25526万元，安置特困山区和高寒山区少数民族移民39459户186850人，转让移民耕地152410亩，建立了3个移民管理区和1177个移民新村<sup>(3)</sup>。清远市的这些移民中，包含了相当部分的瑶族群众。

1993—2002年借调到连南瑶族自治县移民办工作的房国良告诉笔者，1986年—2003年省政府就拨了206万元“石灰岩地区移民搬迁费”给连南。事实上，移民所需金额巨大，单靠政府力量还是不够的，因此移民资金大多来源于多个渠道。一般来说，这些资金来源于政府拨付、国内外民间慈善机构资助、群众募捐和移民户自给，而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比如，始兴县采取“四个一点”（“争取省市支持一点，县财政

及部门安排一点，发动干部群众捐助一点，移民户出资一点”）的办法筹集移民安置资金。2003—2004年，始兴县共获得省移民拨款380万元，市拨款36万元，县财政安排140万元，县属部门配套资金133万元，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募捐28.6万元，共计717.6万元，同时发动移民投工投劳、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到安置点义务劳作、帮耕帮种，降低建设工程造价。移民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立专户、设专帐、定期检查，按照实施方案做出开支计划，由移民理事会申报，逐级审批后拨付建房款（始兴县贫困瑶区移民安置办公室2004）。该县沈所镇上围溪瑶族村对不同批次的移民采取不同的资金补助：

【上围溪村赵建春】搬迁费用第一批每户要出3000元，第二批5000元，第三批6800元，其余由政府全包。住房面积有80.68平米，含外面的则有110平米。住房的基础为两层楼的，但是只做一层，第二层由自己的财力来确定添加与否。

这样安排明显有着鼓励、奖励率先搬迁者的色彩。本次调查的茶亭瑶族村，每户移民需要缴纳5500元，搬到东莞商会民族村的移民则每户要缴纳10000元搬迁费，其余的费用完全由东莞商会资助；大麦山镇政府旁边的“港澳扶轮瑶族新村”，则是由港澳国际扶轮社的廖烈武、云大棉等“本乎仁者之心”捐赠的85万港元，加上上级政府拨款和县内集资共合人民币163.8万元建成；高岭村67户移民的建房费用中，除了省府移民基金出的每户10000元、香港慈云阁基金会捐赠的62万元和社会各界捐赠的一间文化室外，每户尚须自筹6000元及4.5立方米的木材；明联瑶族新村则由海外华侨张明联女士捐赠的100万元和省、市政府拨款100万元以及广东钢铁集团公司、广州水泥厂、佛山市政府捐赠的部分建筑材料共同营建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后粤北瑶族移民的方式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开始是由政府包办，后来逐渐转变为由移民自主兴建、政府补贴。在工作方面成立了由县级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移民领导小组，下设移民安置办公室和由村民组成的移民理事会。安置工作由县统一规划，移民办和理事会具体实施。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则经常深入安置点了解进展情况，定期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视察，确保工程进行和质量。移民的住房及相关配套设施由县移民领导小组统一规划，村民自主兴建。移民安置在瑶民自愿的基础上，采取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相结合、农村安

置与城镇安置相结合的办法, 自由组合, 选择安置点。为了满足少部分有一定文化、技术技能的瑶民希望迁移到墟镇或县城居住的要求, 移民领导小组根据墟镇规划, 适当给予优惠政策, 由瑶民在所属乡镇的墟镇内和县城自行兴建住房。同时采取与当地企业挂钩, 解决劳动就业, 以免移民入城(墟镇)后因难以维持生活而重新回迁。

连南长期从事移民管理工作的房国良说,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粤北移民已经开始, 金坑镇塘冲村就是在当时搬下来的, 当时每家补贴400—600元, 其中一部分是政府支持搬迁的, 一部分则是自发搬迁的。然而, 真正大规模的搬迁还是在80—90年代。在这一时期, 各地方政府设置的移民办公室, 遵照上级的要求对石灰岩地区和高寒山区瑶族群众展开搬迁工作。搬迁工作遵循省里的三个要求: 一、就近安置, 即一般在本乡镇、本县内安置; 二、为了方便孩子上学、群众耕地和赶集就医等, 移民村一般建在地势平坦, 水电、交通方便的地方; 三、移民新村的兴建做到“四个统一”: 统一标准(每户70—80平方米红砖水泥钢筋房)、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和统一施工。

按照以上对石灰岩移民搬迁的原则, 三个自治县先后共搬迁了10382户47565人, 安置在三个县的24个乡镇、152个行政村, 兴建移民新村共375个。其中, 连南5956户27298人, 安置在12个乡镇, 50个行政村, 兴建移民新村200多个; 乳源2433户10361人, 安置在5个乡镇, 兴建移民新村82个; 连山壮族族自治县少数民族搬迁共有1993户9906人, 安置在32个行政村, 兴建移民新村57个(陈夏春2003)。

另外, 粤北的一些散居瑶族也有移民搬迁的问题。韶关市始兴县罗坝镇小安村、隘子村和花山乡合水村等三个村共有367户、1651名瑶胞, 居住在高寒山区, 是所谓的“三无村”(无耕地、无林地、无公路), 生存环境恶劣, 生活贫困。为此广东省政府特批600万元帮助该县解决移民新村建新房的补助费, 省扶贫办和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共同协助做好这项重要工作。经过研究, 该县把三个村的贫困少数民族安置在“山水田林路”综合条件较好的沈所镇及墟镇上。2002—2003年, 始兴县先后在沈所镇的上围溪、下围溪、罗坝东山水、罗坝上岗背坪四个安置点及沈所墟镇、县城城区兴建了228套住房, 购买水田386亩, 桑田108亩, 旱地300多亩, 鱼塘90多亩, 林地800多亩, 购买了养蚕工场房6000多平方米, 基本完善了移居

点的通路、通水、通电以及电话等基础设施。这两年因为建材价格暴涨直接影响了移民兴建住房的进度, 部分移民户在2005年春节前才完成建房主体。现共有105户移民已入住新房, 剩余的123户正在筹备迁移入住之中。(凌伟建2005)

粤北的水库移民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 共移民3468户16163人(陈夏春2003)。本文研究粤北瑶族移民的适应性, 须考虑到适应的时间问题, 因此较多关注80年代和90年代的水库移民。1986年由省政府投资7000万元为连南兴建板洞水库, 解决当地石灰岩群众的饮水、灌溉和发电问题, 从库区迁出206户近700名瑶族居民, 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安置。其中, 80户281人安置在离水库8公里的牛塘林场; 18—40岁的劳动力则安置在县城内的县属党政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工作(连南县板洞食水工程管理局2005)。另外, 乳源于1996年、2000年兴建杨溪水库和坝尾水库时, 也搬迁了700多户近3000人(陈夏春2003)。

### 3. 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原因

粤北山区瑶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搬迁者众。究其动因, 大致不过政治、经济、生态、工程、灾害等几个方面。粤北山区落差大, 水电资源蕴藏量丰富, 为了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兴建水库、水电站等工程, 导致瑶族非自愿搬迁, 如板洞水库移民。除了工程原因之外, 政治、经济和生态原因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 3. 1 政治原因

瑶族先民自南朝末年入粤, 历经隋、唐、宋、元等朝代的发展而颇具规模, 然而朝廷并没有专就广东境内的瑶族制订出具体政策(练铭志、马建钊、朱洪2004: 301)。自元至清, 瑶族起义不断, 致使朝廷对粤北瑶区多次用兵。在有关广东瑶族的史料中, 有着连篇累牍的“剿瑶”奏疏(黄朝中、刘耀荃1984:380-456)。这使得将安全需要作为第一诉求的粤北瑶族大多选择易守难攻的山区作为自己的居住地, 从而造成粤北瑶族这一比较典型的空间分布格局。元代以降直至民国, 历代政府都施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 唐宋时期称呼瑶族的“徭”字改用“瑶”“蛮徭”等污辱性称呼, 含有很强烈的歧视意味, 这阻碍了山区瑶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 也阻碍了山区瑶族的

外迁和山上瑶族的下迁。

新中国的民族平等、共同进步发展的政策，解除了瑶胞走出大山的政治顾虑。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切实实施，使得当初受到历代封建政府压制而遁入深山的瑶族群众愿意迁到外面来居住。这在20世纪50—60年代已有所表现。当代社会“户口政策”的松动，为瑶胞的“穷则思迁”创造了条件。事实上，有些地方安置瑶族群众的田地就是由当地汉族（客家）人响应政府号召捐献出来的，移民的住房也是当地汉族人帮助建起来的。

石灰岩移民和高寒山区移民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府确实也是将这项工程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扶贫、安居等工程都凸显着政府在关心弱势群体、希望全社会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良苦用心。因此，移民与否和当地决策者的重视程度有密切关系，比如始兴县贫困瑶胞的移民搬迁，就是在县委书记亲自到花山乡合水村实地调研后倡议发起的。一些官员本身对经济上落后的山区瑶胞这一弱势群体也有着强烈的悲悯情怀，比如中共清远市委书记骆雁秋1992年陪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连南三排乡检查工作时，就看到的情况作了一首诗：“三排古寨挂云边，石径登攀汗淌肩。破壁瑶家空荡荡，一竿褴褛吊门前。”潘伟（1998）就是一部记载清远市1993—1998年间政府移民过程的纪实性报告文学著作。

### 3. 2 经济原因

北宋之后，粤北部分瑶族受到汉族影响，定居化、农耕化为新的支系——排瑶（练铭志、马建钊、朱洪2004：296）。他们摒弃传统的“游耕”的生活方式而聚落为村，耕田种地。然而，“低技术的劳动密集，资源匮乏下的精耕细作，面对城市的相对剥夺和庞大的剪刀差，形成了相当部分乡村社会的内卷化”（张小军1998）。山里的资源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山里经济的“内卷化”现象使得瑶胞生活的艰难程度增加，而山下经济的快速增长，珠三角强势经济的辐射与吸引（拉力），使得空间距离本不是很遥远的粤北和珠三角地区，获取同等报酬所付出的成本和劳力相差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这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势差。山区之外的地方发展势头迅猛，即使在山脚下的地区也比山上多有很多谋生赚钱的机会，外出者发财致富几率远远高于原居地，这使得山区瑶族人心思迁。

石灰岩地区、高寒山区存在着各种移民的推力，生态环境恶化，带来吃水难、吃饭难、结婚难等诸多问题。山下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带动下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各种相关生产生活设施迅速改善，比如就医、子女教育、吃水、交通等方面都明显优于山上，这些都对山上的瑶胞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拉力。在这些推力和拉力的综合作用下，一部分信息灵通、头脑灵活的瑶胞在政府确定搬迁之前就已经主动搬到山下的平川地带生产生活了。有些人自发下山租地耕种或外出打工，挣到钱之后对未迁移者造成了一定影响，也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最终促使政府决心采取行动对这部分贫困瑶胞进行搬迁。

交通不便，计划生育管理鞭长莫及，导致山里的瑶族人口不断膨胀，从而导致人地矛盾日渐凸显，经济状况恶化。土地是农业生产最重要的资源，其数量和质量对于农民来说至关重要。石灰岩地区能被开发利用的土地十分有限，乳源东坪镇的缺地现象就较为严重。虽然人均占有耕地不算太少，但由于坡地多、地块小、土层浅、土石混杂、漏水漏肥、地力贫瘠、产出率低。按目前的人口规模和平均地力估算，有些石灰岩地区的人平均耕地不足0.5亩，生活很难维持下去，于是只好外出谋求生存和发展。

石灰岩山区瑶族百姓的经济极为窘迫，这在他们搬迁时就可以看出来。从连南南岗乡新村管理区迁到清新县三坑镇明联瑶族新村的瑶族，在搬迁时政府只给每三户移民安排一辆货车，可以想象其家中财物之寡少。他们从山上背下来的东西是一扎扎的木板、一捆捆的柴草，几麻袋稻谷、杂粮和旧衣服，装上车运到新居地的东西，大多数是木料柴草（潘伟1998：38—39），这些就是他们自认为很重要、很值钱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也就是他们家中最为值钱的“家当”。

连南高岭的移民说，老村1994年才安装电灯，但是因为收入少，很多人连电都用不起。每度电要收1.3元电费，每月电费8元，但是就连这8元钱也交不出来，因此约有30%的人家因此而被停电。1996年时他们还住在山上，以种植大米和地瓜为主，人均收入仅为460元，生活极为贫苦。有一户人家的老人因为生病而无钱医治，最终在家中病死。

### 3. 3 生态原因

粤北山区瑶族的流动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是多种原因综合

作用的结果,其中极为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态原因。粤北山区多数地方地质地貌属喀斯特地貌结构,石灰岩地区和高寒山区地域面积分布较广,环境承载量低,由于某些不恰当的砍伐,使得生态环境更形恶化,自然灾害发生率亦随之趋高。

建国初期时粤北瑶族的生活极为贫苦,瑶民“鹑衣百结”、“多赤足”、“生产量甚差,生活非常艰苦”(黄朝中、吕燕华 1951)。长期居住在高寒山区的贫困少数民族,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过分的“靠山吃山”使得人地矛盾突出,可获取的资源越来越少,发展空间越来越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贫困程度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一方山水养不活一方人”的局面。这种山区瑶族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态原因。毁林和污染不仅危及到动植物的生存,也使连南的农业生产陷入困难的境地,使瑶区逐渐失去了水力资源优势(许文清 2002:81-89),从而威胁到瑶族居民的生存和发展。

粤北山区的生态环境并非原来就不好,而是在遭受到多次的“人祸”之后才变得这样脆弱不堪。建国初期,人们还记得当地的石山上到处生长着杂树和灌木,有的老松树要两人合抱才能围树干一周(潘伟 1998:20)。可见,当时的生态环境并不坏,即使是石山,也还是青山绿水。但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在“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等急躁冒进思想的指导下,大量砍树伐薪烧炭,大量的承载着水土保持功能的林木被砍伐一光。“文革”时期,山林无人管理,在“以粮为纲”、“向山要粮”等口号的蛊惑下,乱砍滥伐、烧山开荒,使得石灰岩山区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经不起暴雨山洪的考验,泥石流、山体滑坡常常伤害人畜、摧毁村庄,最终不得不由政府、国内外慈善团体、个人筹款捐资,异地再建村庄。连南瑶族自治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该县居住在海拔500多米以上高寒山区少数民族实施大规模移民搬迁,尚余480多户分散在各个山头。2002年7月,一场洪涝导致该县金坑镇遭受重灾,部分乡村山体滑坡,近400多户瑶族同胞无家可归。有鉴于此,广东省扶贫办筹资200万元对该县高寒山区最贫困的少数民族实施移民搬迁,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则通过向宗教界募捐筹资200万元,帮助该县金坑镇受灾情况最严重的竹新、泥楼、鱼岔坑三个村共179户、881名瑶族群众实施移民搬迁(凌伟建 2005)。

始兴县花山乡合水村有田丘段、田心、塘斗、左拔一组、左

拔二组等5个村民组,7个居住点,177户784人,离县城20多公里,地处大山腹地,交通不便。山内瑶胞除左拔一组、二组43户250人人均拥有耕地0.3亩外,其余无田无地。这就导致当地瑶族群众没有经济来源。据统计合水村特别贫困户数占全村户数的75.7%,特别贫苦的人数占全村人数的68.1%。原来当地人靠山吃山,以卖木柴、抓山猪、割山笋、采香菇等手段谋生,而当森林资源过度采伐之后,当地瑶族百姓的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下滑趋势。封山育林和禁伐禁猎后,这些谋生手段都相继出现了问题,生活水平从1994年逐年下降,人均不足1000元,个别村民组不足700元。山林减少,植被受到破坏,蓄水能力降低,这使得水资源日益枯竭,如合水溪目前的流量就只有当初流量的30%;同时,过度砍伐使得山林保护水土的功能日渐丧失,生态失衡而导致灾害防止能力下滑,这最终酿成了恶果。2000年9月,缺乏林木保护的合水村在大雨之后爆发的山洪中损失惨重。据统计,该村受灾人数多达400人,坝地菜园被冲,7户房屋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达100多万元(凌伟建 2005)。山洪污染供水系统,造成县城居民饮用水污染好几天。无独有偶,连南瑶族自治县金坑镇在暴雨山洪导致几个村庄所在地出现山体滑坡之后,无家可归的受灾群众不得不另觅安身立命之所。

在自然的惩罚面前,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近年来已经开始重视绿化造林,但是树木生长缓慢,生态平衡、生产条件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 4. 粤北瑶族移民搬迁的文化适应

施国庆、陈阿江(1999)认为,广义的社会系统包含经济、社会(狭义的)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因而移民变迁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程瑜(2004:117-136)则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描述了三峡移民的适应性。我们认为,对于山区移民搬迁之文化适应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可以从物质层面、社会(狭义)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描述和解释。在物质层面,应该关注移民的生计模式,这包含了经济来源、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等与移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方面;在社会层面,应该注重对移民原有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的破坏和新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在精神层面,应当关注移民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方面的适应状况。

尽管移民搬迁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是这些搬迁者都面临着对迁居地的文化适应问题。粤北瑶族从高寒山区迁到山下，从石灰岩地区迁到土地肥沃的平川地带，从水库的涉淹区迁到新的地方，都必然存在着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这主要体现在对新的生计模式的适应，对新的生活方式的适应，对断裂之后的社会网络的重建，对原居地的宗教信仰的坚持和变通等方面。因为粤北瑶族移民中，绝大部分都是以村庄或几个乃至几十个家庭一起搬迁的，空间移动距离不大，因而他们在制度性层面的适应性表现并不典型，本文不赘述。在大量访谈资料的基础上，下文从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对这些瑶族移民的文化适应做出描述。

#### 4. 1 物质层面

对于粤北瑶族移民来说，解决生活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因此粮食的获得，经济情况的改善都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这就涉及到移民的生计模式问题，生计模式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移民的生活方式。

##### 4. 1. 1 生计模式

建国前，排瑶多择高峻之处而居，以农业（耕田种地）、林业、狩猎、采集山货为生。现在，排瑶居住地有三种地域：纯林地区（金坑、涡水）、半林半农地区（大坪、香坪、盘石乡和大麦山镇的九寨、白芒等地）和耕山为主的石灰岩地区（三排乡、南岗乡和大麦山镇的中心岗、后洞、三洲等地）（连南县志办公室 1996:165）。过山瑶居住在偏远的山区，水田极少，旱地占耕地面积的 90% 以上，以从事耕山、狩猎和采集山货为生。耕作按照季节时令进行，但方法较为粗糙，施肥很少，常常广种薄收。（连南县志办公室 1996:168）

从山上搬到山下之后，粤北山区瑶族的生计模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他们也都采取了相应的、最低成本的适应策略。

【茶亭村赵永明】在山上，干旱的时候农田不能保证灌溉，产量只有 300 多斤。搬下来之后，每户名义上有 2 亩荒地，但是实际只有 1.5 亩，粮食不够吃，只有到附近的地方租耕水田。政府给的田没有水，租种的土地有水，租种了 2 亩地，

每亩每年要交 150 斤谷子，比博罗村的要少交 50 斤。全家有 3 个小孩，夫妻二人，大儿子已经结婚，有时在当地打工，老三男孩，在民族实验中学读初二。老二是女儿，在本县的锡箔厂打工，每月有 400 元左右，早晚在家吃饭，中午由厂里负责。初中毕业后已经在厂里干了一年。

【东莞商会民族村赵锦辉】1963 年出生，原来住在东坪镇茶坪村委五组，1995 年冬季从茶坪村搬到龙王潭。当时龙王潭属于附城镇，现在附城镇已经撤消，合并到乳城镇。农闲时候打工，一般是泥水工，每天约有 20 多元，多的时候每年有几千元的收入。因为土地少，租了 2 亩多的水田，每亩每年交 1.5—2 石稻谷，亩产量有 700—800 斤，差的时候有 500—600 斤。本村另有养猪的地方，我家养了两头猪，一头卖一头吃。

从上述两位移民的访谈中可以看出，高寒山区瑶族移民在山上时，虽然有田有地，但是因为海拔、灌溉、耕作技术等的限制，粮食产量不高，因而吃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其解决之道是多种；搬下来之后，粮食产量高了，但是自己的田地数量不够，粮食保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粮食不足，这部分移民没有回到山上耕作，而是就地租种汉族人或其他不以田地为主要生计的人家的田地来耕种，这是经过权衡之后而采取的适应措施。在粮食之外，移民们考虑的是如何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农忙之余，移民们采取打零工的方式来挣钱。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生活选择与上辈人有一定的差别：有的还是沿袭父辈的农耕生活，但是打零工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之一；有的干脆进入当地企业，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工作，农业生产对于他们来说退居次要地位。

这类移民的生计模式有时也受到新村和旧村之间的某些实际情况、受到移民自身素质的制约和影响。

【福民新村李明俊】我是修理工，可以搞家电维修，很多人知道我这里，因此不用到街上摆摊设点。这里没有耕地，连种菜的地方都没有，全都在龙头。一般人起来之后，就回到龙头耕田种地，田有 1.2 亩，山地有 8 亩多，山上的田地都不好种，很小块，亩产 700 多斤，每年只种一造。田里种水稻，地里种山姜，山里种树造林，房屋周围还种些蔬菜。

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有些去了外面打工,珠三角城市为主,有去深圳、珠海、顺德等地,但是大多数都回到龙头村山里去耕种了。

由此可见,福民新村的移民搬下来之后,谋生方式产生了差异。李明俊因为有修理家电的一技之长而在移民村生活无忧,而一般移民则还是得延续原来的谋生方式,回到龙头去耕种土地。有些没有牵挂或胆子较大、头脑灵活的就到珠三角城市打工。

在笔者调查过的这些瑶族移民中,高岭移民和上围溪移民活得似乎要滋润一些。他们说:

**【高岭村】**在山上的时候,养了猪也卖不出去,抬出去已经中午,集市收摊了。现在户均2头猪,喂猪只要种一些菜叶或野生菜叶即可。现在人均4分水田,还租种河旁的水田和旱地20多亩,都是好田,每年每亩租金为2石,差一些的田的租金只有1石,旱地一年租金为5—10元/亩。旱地种菜、花生、香粉树等经济作物。香粉树用于制作烧香的原料,这两年才开始种,有几十亩。一棵香粉树有400斤左右,100斤卖12元,8—12年成材,每亩可种100—110棵。这种树有一种特点,砍伐后还会再长出来,有利于水土的保养。毛竹家家户户都有。现在偶尔有老人上山去挖草、摘茶叶。砍木材,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只给砍1.5立方米,除去人工费用,每立方米才卖120元,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现在村民都不想去继续开山种树,因为种杉树16—17年才成材,周期太长。

**【上围溪村赵建春】**现在村里有小包工头,承包山地开发和搬、砍竹子,每天有40元左右,有几十个人。采松香的有20多人,都是承包松树山的,采松脂。采松脂的每人每年有7000—8000元收入。有5户养蚕,年收入2户有10000多元,其他3户有5000—6000元,桑叶是自己种植的。水田一般只种下造,每年一造,亩产600—700斤,收水稻之后种花生。县农业局、镇农业站经常派人来指导。原来的五个组只有左拔一组、二组种田,田也很少,也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其他三组的村民都是搬迁之后才学习种田的。老村中左拔一组、左拔二组有200多人,种田只种中造。因为种子不行,山上的水稻在1990年代亩产只有200—300斤。搬下来引入良种之后,亩产达到600—700斤。山上虫害没有

下面这么厉害,只要用1605农药除一次草就可以了,平均一亩用一瓶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的田地,一造要杀6次虫。肥料也很贵,山上不用买这么多的肥料,因为用稻草等土杂肥,火烧之后就是肥料。

可见,高岭瑶族的生计模式与上述几个移民村大同小异,主要是养殖业、租种田地和经济作物,而上围溪仅采松脂、养蚕、砍竹等就比在山上的时候收入要高。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种稻,山上山下由于环境不同,所需的知识、技术也判然有别,因此,移民们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各种培训措施的帮助下,这一过程进行得还算顺利。

上面谈到生计模式都是从农民到农民的移民,虽然他们的谋生模式改变了,但是身份并没有改变。板洞水库的移民则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经历了农民到非农的转换,因为在搬迁的时候全体村民就已经统一实行“农转非”了。

**【牛塘林场陈宏隆】**在老家有田地,有山林,可以砍伐杂木去卖,每年都有些收入。在板洞的时候,我家10多个人,10多亩田地,种田为生。原来的田地每人1亩多,搬到牛塘林场就太少了,每月仅靠居委会发给每月90元的生活费,温饱都保证不了。1994年安排我到径口电站工作,每月工资350元。儿子未成人,因为我在电站有工作,就要负担孩子生活的一半,因此每月只有45元生活费。我老婆没有工作,每月只有靠90元的分配款生活。算起来,我整个家庭的工资收入每月一共是485元。我儿子在三江镇读书,生活费每月就要200元,差不多就要花掉家里一半的工资收入。我二弟在我们的居委会工作,每月工资有215元,加上90元的分配款,月收入一共就是305元;我小弟弟在食水管养所工作,月工资在300—400之间;大妹妹在黄连电站工作,月工资也不到400元。我老婆和我的另外两个妹妹没有工作,就只有在外面打零工以补家用,比如给矿场的工人煮饭,每年大约有2000—3000元的收入。她们有时候在外面居住,大多数的时候还是要回家。

可见,“农转非”之后的牛塘林场瑶族移民与前面提到的移民情况都不一样,其生计模式也显示出与前面几种移民不同的地方。牛塘林场瑶族移民比较典型的生计模式就是陈宏隆家的这种情况:一个家庭成员按照移民政策安排在电站工作,一个家庭成员只领90元的生活津贴但是可以在外面打零工挣外快,

孩子领取 45 元每月的生活费。这种收入水平相对于现在粤北的消费水准来说还是偏低了，因此陈宏隆在采访过程中多次抱怨连南第一中心小学不给自己解决孩子每学期 400 元的借读费，还抱怨每月摩托车的油费都要花 100 多元。

总之，粤北山区瑶族移民之后，他们的生计模式都普遍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而谋生手段则出现了多元化趋势，较之在山上时相对单一的模式有了更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比如，连南南岗乡蜈蚣田管理区的瑶族 236 户移民，只是从山上搬到山下，然而其生计模式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山上缺水少田、交通不便，以耕山种苞谷和番薯为生，生计模式单一；迁到山下之后，有的买拖拉机跑运输，有的开摩托车载客，有的开商店，有的搞煤炭销售，有的在煤矿上打工，有的延续原来的农业生活。有的人则抓住时机，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比如，连南南岗乡蜈蚣田管理区唐亚利，在山上时住茅寮，穷得连结婚都要借猪借粮，搬迁之后通过开采煤矿，终于发家致富，家中防盗门都装了四道（潘伟 1998:102-105）。

#### 4. 1. 2 生活方式

有人用顺口溜来形容石灰岩特困地区的瑶胞生活：“六根木桩一间房，几片木板一张床；三块石头一个灶，一根竹竿晾衣裳。”这生动地呈现出山区瑶族贫困和因陋就简的生活方式。

在吃的方面，因为空间跨度不大，没有什么变化，因而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方面。福民新村李明俊说，因为田地都在原来的居住地，菜、粮食都是从龙头搬出来吃，如果碰上下雨回不去的时候，也在街上买一些常吃的菜，因此吃的方面与搬迁之前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不过是搬下来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的肉类比以前多了。

在用水方面，山上时，有些瑶族在积水的池子或山泉处，用竹筒将水直接引到家中。而现在，一般都有自来水。但是也有个别没搞好配套工程的移民点，移民们为吃水问题伤透了脑筋。比如：

**【茶亭村赵永明】**现在有自来水，但是水源不足，下雨天才有水，冬天和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没有水喝。村那边挖了一口井，下雨天的时候才有水，冬天井里面没有水。在沙塘有个水井，走路要 40 多分钟，要到那里挑水来吃，整个冬季都要挑水。全家 6 口人，养有两头猪，每天要挑 3 担水

才够。

可见，茶亭瑶族村的吃水配套工程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此就给移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煮饭所需的燃料，有两条解决途径：一是每年冬天回到山上原居地，砍伐那里的木柴，用拖拉机运下来；二是在附近的加工厂买一些木糠。乳源茶亭的赵永明家就是这样解决燃料问题的：

1992 年开始，本人就来到附城镇博罗村租水田耕种，2003 年搬下来后，烧的木材是从老村的山上砍伐的，每年砍 2 车，一般是冬天去，用拖拉机拉回来。另外也烧一些木糠，从地板加工厂买来，每拖拉机木糠 50 元，运费要 30 元，合计 80 元，每年也要买 2 车。

在燃料方面，事实上相当数量的移民已经用上了煤气灶，但是对那些获取木柴等燃料较为方便的移民来说，很多人还是会沿袭在山里面的那种烧柴煮饭的习惯，即使房间会被烟熏火燎之后变得很脏很黑也无所谓，因为煤气“浪费”钱，而柴草只需付出劳力和时间，显得更为经济实惠。所以，我们调查的一些移民村中，木柴燃料的储备一般都比较“丰富”，有的移民村的通道上甚至会被这些柴草堵塞了。

在穿着方面，原来在山里的时候，都是熟人，穿衣就随便一些，显得较为朴素。搬下来之后，年青人对穿衣打扮要求高了一些，总是不自觉地与镇上的孩子攀比，向那些人靠拢。有的怕别人笑，有的是为了赶潮流，因此穿民族服装的机会少了。事实上，这是由于新环境对瑶族移民产生的文化压力引起的文化适应现象。大麦山镇的镇党委书记戚先生谈到瑶族移民的穿着时说道：

原来是自己织土布来穿。现在极少有人穿土布，即使穿也很干净。因为通婚、出来工作等原因，使得现在瑶族的民族服装、民族特色有些退后。但是，在嫁娶时，还是必须穿上民族服装。大麦山镇还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比如刺绣、腰鼓、打铜锣、吹牛角等。

由此可见，瑶族服饰在粤北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瑶族同胞的穿着逐渐与当地汉族人趋同。但是，在某些场合是必须要穿民族服装的，比如结婚。这就是说，瑶族服饰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一个逐渐淡出的趋势，而只有在某些强调民族特点的仪式、场合中才当作一种民族符号、族群边界得以强调。

在住房方面，移民后的房屋大多是由移民的主管方统一设计，然后征求移民代表的意见而拍板。总体来说，移民之后的房屋要比移民之前好得多。

**【高岭村房光良】**在山上住的房子都是用泥巴砌成墙壁，有 60% 的用杉皮盖房顶，只有 40% 的用瓦片盖房顶。1998 年搬迁之前，我家中有父母亲，6 兄妹，本人排在第二。当时全家住 4 间房子，都是泥土杉皮房，父母亲住一间，大哥住一间，早上、晚餐吃白米饭，中午吃地瓜，早上六点多钟就下来耕田。搬下来之后，住房都是平房，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现在有 60% 的人家改建过，其中二层以上的人家有 20 户左右。

**【牛塘林场陈宏隆】**我家于 1993 年底时搬到现在的居住地。当时的住房是由集体用移民款和旧房折款建造，造价为 220 元/平方米，每户共 120 平方米。房屋由指挥部统一筹建，建好之后统一扣钱。原来住的泥砖房，折价 60 元/平方米，另外发给每人 2000 元的移民费。当时的住房只有一层，现在正在加建第二层。去年政府说有 10000 元的补建房费，所以我借钱补建第二层。上面要求建到窗口那么高才给 5000 元，建完之后再给 5000 元。现在我家补建房已经花了 17000 多元（材料费、人工费），还不包括请人的伙食费。

因为经济条件差，建筑材料搬运困难，瑶山上人无厕所，猪牛无舍，人畜混居的状况偶尔有之。而在新的移民点，这些情况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每家都有独立的厕所、猪圈和牛舍。尽管移民之后的房屋比在老家时的好，但是在某些因素的综合考量之下，有些移民还是宁愿回到自己的那个“草窝”。

**【福民新村李明俊】**没有小孩子读书，没有必要住在新村。如果有小孩子读书，那就要在这边照顾孩子，因为孩子来回走 10 多公里很辛苦。等到孩子长大一些可以自己料理生活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自己在新村。

为了孩子的上学问题，福民新村的部分移民过起了老村和新村之间来回奔波的“两栖”生活，而那些没有这种负担的移民，干脆回到自己的老村。连山小三江镇立星村的移民，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出现了移民的“回流”现象和移民新村的“空心化”问题。

在山上的时候，很多瑶族同胞家中的家具极为简陋，仅

有饭桌、凳子、水缸、铁锅、碗、筷、碗柜、石磨、碓等，这些家具全都拥有的家庭可以算得上是富裕家庭了（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 1992:240）。搬下来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富裕家庭中，现代家具、豪华装修、昂贵电器等等应有尽有。一般家庭中的家具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尽管山上瑶族也有少数家庭仿照汉族人砌有炉灶，但是搬迁之前的炉灶与搬迁之后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一般来说，除了寝室外，山上瑶族在每个厅、房内都设置一个火炉塘，其位置在紧靠寝室睡床一侧；火炉塘用于炊事和取暖，冬天有时也在塘火附近烤火取暖甚至睡觉（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 1992: 239）。这种有瑶族特色的炉灶俗称“三脚猫”，即用 1 个小圆铁圈，下有 3 支铁条支撑。搬下来之后，灶台由建房的施工方统一建造，一般都用砖和混凝土靠墙砌成，专门用于炊事，专设于厨房，更为卫生、节省和安全。

在交通行走方面，移民点一般都有公路，比在老家的时候要好。粤北山路之难行，诚如黄朝中、吕燕华（1986[1937]:423-424）所云：“瑶山道路，多依山势开辟，崎岖曲折，倾斜异常……瑶排与山下市集的通道，亦多羊肠小径，难于行走，排与排间，更是兽蹄鸟迹之道”。这是粤北不能实现“货通”的瓶颈，从而长期困扰着粤北经济的发展（顾宝炎 等 1999）。搬迁之前，始兴县花山乡合水村的一些居民点全是山路，无法通机动车；有的居住点单程到镇上一次要涉水 25 次，翻越山坳 5 座，历时两个多小时（凌伟建 2005）。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搬迁前后的交通情况确实有着天壤之别。

**【上围溪村】**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隔公路有 2 公里多一些，有一段路原来是开发区搞的。现在我们出外主要靠摩托车，80% 的人家有摩托车，有的旧一些，有的没有行驶执照。一家有两部摩托车的有 20% 左右。

**【高岭村】**交通条件改善了，平坦的水泥公路一直延伸到家门口，使得原来一直依赖双腿走路的瑶族移民，也开始买自行车、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高岭村的中年妇女人人都会骑自行车。

**【福民新村李明俊】**我老家在福堂镇肖溪村委会龙头组，离这里有 11—12 公里路，现在我一般不回龙头（老家），要走 1.5 小时的路。现在人们与老村之间的来往大多用自行车，出来下坡用 45 分钟，回去爬坡多一些，要花一个小时。

可见，交通状况改变之后，瑶族移民们出行时不再仅仅以双腿来走路，而是用上了自行车、摩托车等代步工具。小孩子自然适应得比较快，而中年人经过努力之后也能熟练掌握这些交通工具。由于受到身体条件的限制，老人在这方面的适应状况总体来说要差得多。

由于信息传递比山里快得多，这在一些时候直接影响着移民们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因此很多移民家中都装上了电话，一部分也配上了手机。这在山里的时候基本上不可能，一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二是山里的通讯信号很差，有的地方甚至完全没有信号。

除了一些不成功的移民案例外，粤北瑶族移民不只是吃穿住行等方面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全方位的变迁。比如，连南金坑乡高岭村有68户295人居住在800米以上的高山上，1996年人均收入仅900多元。1997年从高寒山区搬迁到山下，不仅当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2002年人均年纯收入2350元，当年有80%的农户购买家用电器，并安装了有线电视，三分之一的家庭安装了电话（陈夏春2003）。村里文化生活也丰富了，建有文化室和篮球场。下面是瑶族移民对自己新生活方式的陈述：

**【上围溪村赵建春】**电视方面，90%的人家都有，电话60%人家有。电视有20%的是黑白电视，用自己弄的天线收视。现在有线电视还没有安装，但是可以在家里搞一个数码接收器，能收到10—30个频道，与有线电视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家中还有热水器、VCD、脱水机等等。通讯方面，原来一部电话都没有，现在60%的人家有固定电话，手机普及率也有40—50%，我们村里至少有50部手机。自来水方面，老家从坑中用毛竹将水引到家中，干旱季节有时要挑水饮用，现在用自来水，移民工程有供水工程配套。气候方面，山上在6—8月比较凉爽，而搬下来之后觉得比较热。晚上要睡在地板上，不然睡不着，因此感到很不适应。有些人在6—8月份的时候就回到山里居住，避暑。

**【高岭村】**原来在山上的时候，老人家很少洗衣服，因为要下山耕田，只有那些没有姊妹的，才自己洗衣服。操劳了一生的老人们下山之后，有时候坐在家里没事可干，闲得心理发慌，感到不习惯，于是就找些活儿干，比如洗衣服。

**【大麦山镇党委副书记】**三洲村原来是无电村，没有电话、

没有电视机，搬到港澳扶轮新村之后电灯、电话、电视都一应俱全。

**【扶轮新村房惠明】**原来住在三洲的时候，很少下山来，非常辛苦，每年种田不够吃，一些粮食要从下面用肩膀挑上去。带山货到市场上来交换有无，“一担来一担回”，买米和生活用品回去。山里物产少，自己种的不够吃，现在这里比在山上好几倍。要是在山上，现在孩子娶老婆都成问题，因为教育落后、山路难行。因此，有时候我带上孩子回到山里去体验生活，教育他们要努力读书，否则就要回到祖辈居住的山里。

#### 4. 2 社会层面

在粤北瑶族的移民中，因为前述几大原因，大多数有着搬迁的意愿。在搬迁的过程中，政府机构、社会各界都给予了很大程度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总体上而言，瑶族移民在搬迁过程中获得了不少的利益。况且，如果对搬迁不满意、对迁居地感到不适应的时候，他们还有一条退路——回到自己的老家，重复过去那种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茶亭瑶族移民现在与在老家没有搬下来的亲戚还经常来往，过年过节的时候也要互相探亲。福民新村的很多瑶族移民则干脆将建造得宽敞明亮的移民房空置不用，而回到老家龙头村去过那种外人眼中看来落后不前的生活。高岭瑶族移民中有些老人夏天要到旧村去住半年，名为养鸡养鸭，而实际上还可以缓解自己长时间离开故土的思想情绪，治疗自己在移民中遭受的各种刺激带给自身的心理创伤，同时也可满足自己与当地留下的老朋友们对社会交往的需求。他们对于社会不适应的最差结果，就是“回流”，回到那个曾经想要离开的地方。

但是，对于水库移民这种非自愿性移民来说，情况显然不同。他们移民之后，没有了原先的家园，没有了退路，因而在搬迁之后极容易产生患得患失的感觉。在生活如意的时候，他们对社会的不适应，对故土的怀念、认同等方面的缺失就被掩埋了起来。但是，一旦生活中产生了某种危机，而移民们如果都认为这与搬迁有关，或者本身就是搬迁造成的，那么，他们对于新居地社会的不适应、对于故土强烈的怀旧和认同就会以一种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正如迈克尔·塞尼（2000:303）谈到“社会性的关节脱臼”时所说：“被迫的人口迁移，虽是广

泛而有益的开发工程的一个部分而有其必要，但却往往总是引发危机。对其受影响的居民，它总是带来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破坏。这样一种脱臼中断了原来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关系。它摧毁了现存的生产方式，打乱了社会网络，使人们背井离乡而陷入贫困，危及他们的身份认同，增加了传染病和健康问题的风险。而引发人口迁移的国家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往往未能实施有效的计划以消除这些不利影响。”

下面我们就以板洞水库移民为例来谈谈这种社区解组、社会脱臼引起的不适应问题。令人忧心的是，部分迁到连南城区厂矿的移民因为各种原因有职工及家属 128 人下岗失业，尤其是三星水泥厂因转制而新增下岗人员及家属 86 人，其生活只是由政府发给每月 120 元的生活补助费。据说，从 2005 年 7 月起调整为每月 130 元（连南县板洞食水工程管理局 2005）。这部分人心理很不平衡，有的跑到牛塘林场帮助砍柴打零工，有的提出要开垦大麦山镇西南、离牛塘林场 17 公里的菜坑，而有些人抱怨移民不公平。同样一件事，关系好的很快就批下来，没关系的则老是不批；读书毕业的孩子，有关系的很快就找到工作，没有关系的则难以找到工作，比如陈宏隆的老婆、妹妹都没有找到工作。陈宏隆说：“年青人觉得很气愤，才去砸水库管养所的门窗。”笔者调查期间，板洞水库管养所和食水工程管理局被移民踢坏或用木棒砸坏的木门和玻璃窗仍然没有修复。

**【牛塘林场场长祝世海】**我们现在的生活比在板洞的时候难得多，因为大部分人没有活儿干，要是在板洞的话，大家还可以有田地可耕。现在年青人出不去，有对立情绪。移民的时候只安排 18 岁以上的，而 18 岁以下的全部没有安排工作，因此有些人长大之后就到下面（广州、东莞等地）去找工作，找不到，又回来，因而很苦闷。广州、东莞给他们的工资很低，劳动强度太大，技术型要求太高，而这些孩子文化低，因而有的进不去，有的进去也干不长，只有 4—5 个人在下面干得还算可以。年青人一般都想几个人一起下去，但是有些人有了老婆和家庭，也就不去了或去不了。

这显示出部分水库移民对自己移民生活不适应的方面，在下岗、不公平待遇、找工作碰壁等导火索的驱动下，这种不适应以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显现出来。

这种不适应究其实质来说，就是对于社区解组、社会脱臼之后的不适应。移民以家庭为单位，一般不会危及到家庭结构

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非自愿性移民一般很难保证他们家庭之外的所有初级社会关系，这就是造成社会适应方面问题的关键。以血缘、地缘为特征的初级社会关系，有着四个方面的功能：是农民维持和发展生产的重要社会资本；对基层社会具有良好的整合功能；具有一定的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意义；是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施国庆、陈阿江 1999）。当初在板洞时，龙归寨、大洞、大石、灯芯塘、福门等五个村庄的居民已经有了一种互为依赖的社会关系，而每一个村庄本身更是一个共享信息、共同分担风险的有机整体。但是移民之后，原有的社会关系有的被割裂，有的被扭曲，有的因为身份、环境的变化而失去效用，因而瑶族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普遍经历了一个从混乱到重构的时期。移民是否划算，不仅要计算经济上的得失，还要充分考虑到社会资本的得失。在农村作为一个农民，只需要处理好邻居、农友、亲戚等关系，生活问题就是安全的，生计也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因此，他们在社会关系出现缺环的时候，只要在生计无忧的情况下，总会通过这些初级社会关系找到很多的补救措施。但是在移民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自己的生计（就业安排）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上，而当这种生计危机长时间得不到有效处理之后，这种由于对移民后生活风险的估计不足，在当初移民时抱有的某些期望值落空带来的失落感，都会引发他们强烈的心态失衡，从而导致做出某些过激的举动。

另外，移民们对于新居地的语言的适应也是社会层面适应的一个方面，因为移民是否成功，一个指标就是看他们能否顺利的融入迁入地。融入迁入地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他们能否顺利地习得与迁入地原有居民共同使用的共同语，或者说能否达成某种双方都认可的交流方式。移民们总是倾向于充分利用自己原有的社会资源来缩短这一适应过程。连南三江镇高岭村瑶族移民的小孩一般都到新塘小学（属于三江镇管）读书。虽然在新村旁边就有一个学校，但是因为老师不懂瑶语，教育水平低，因此仅有 10 人去读。而由省计委拨款、为新塘和高山村单独建的新塘小学，在 2000 年建成之后就有 20 多个孩子去读书，因为该校有 3—4 个老师会讲瑶话，学前班和一年级的时候使用双语教学。

#### 4. 3 精神层面

粤北山区瑶族在搬迁之后，由于离开了相对封闭的山村，进入到与市镇更近、经济状况更好的区域，进入到与其他群体接触更多的环境，周边的一切都在影响着他们已有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

##### 4. 3. 1 思想观念

搬迁之前，信息闭塞，出外打工的人很少。搬到山下之后，打工作为一种来钱比较快的生计模式，为移民所乐于采纳。这在上围溪和高岭等几乎所有的移民村都有所体现：

**【上围溪村村长】**搬迁之前，很少有人外出打工。搬下来之后，全村有 30—40 人到外边打工，大部分在附近的工厂，比如德宝玩具厂（港资）、标准玩具厂（港资）、花厂（塑料花），其中德宝和标准有 20 多人。万达玩具厂有几个人，健滔化工厂（港资）有 3—5 人，标准厂和德宝厂发招聘广告到本村招工。另外，本村还有 10 多个人在广州打工。

**【高岭村】**以前在旧村一般是没有去打工的，因为往返要 2 个多小时。搬下来之后，交通方便，因此打散工的人很多。本村的经济收入以打工为主，占全村总收入的 80%，打工的职业以建筑为主，每家每户都有。全村有 5—6 人在利发毛织厂（港资）打工，每月 450—500 元。本村有施工队、包工头（全村有 4 人），临时可以加入，而且当天就可以拿到现金。

这在表面上看是生计模式方面的一种权变，但是其深处同时也反映了粤北瑶族移民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变迁——他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增强了。在过山瑶的生产活动当中，有两种帮工而不取酬的集体劳动，一种叫“斟工”，一种叫“打会”。前者指做工时轮流帮工，自带膳食，不留宿，不计报酬，只在完工时才由主家招待一餐饭；后者指劳力不足时，找“会头”用烟丝邀请大家按时前来帮工，不计报酬，不用还工，主家只招待一餐简单午饭，在春节初二或初四的时候再请帮工者吃一餐即可（连南县志办公室 1996:168）。这两种情况都谈到过山瑶“不计报酬”的助人为乐的精神，前者以还工为报答，几可相抵；后者办很大的事情，只以两餐便饭为谢，其价值之差显而易见。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这种“喻于义”而不“喻于利”的精神毕竟只能存在于那种村庄型的熟人文化环境中，面对谋生

的压力，劳动力商品化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瑶族移民们也加入了这种流行的打工潮流，这事实上是对现代商业社会的一种积极的适应。

**【大麦山镇党委副书记】**思想观念变化较大。未搬下来之前，顶多只是打些零工，下来后有些就到广州、珠三角打工了，但是至今做生意的人还是很少。

这只是大麦山镇的情况，而其他一些地区的瑶族移民的思想观念与他们相比，市场经济意识就强多了。比如：

**【上围溪村赵建春】**二组有一户叫王武生，现年 40 岁左右，从 2002 年开始承包太平镇的山头，开始种香菇，后来又承包山林采松脂，办松脂厂，每年收入 20000 多元。现在家里已经盖了两层楼，是本移民村最先建两层楼的。

可见，民族地区移民迁到靠近城镇集中居住，受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影响，以及一些先富起来的移民的典型效应，增强了他们追求发展的信心和欲望，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当改变了生存环境，劳动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之后，一部分瑶族移民掌握了商品经济的利润原理，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搬迁之后，瑶族移民的婚姻观念也有了一些变化。原来为了群体的生存壮大而限制女子外嫁的婚姻禁忌业已废弛，瑶汉通婚的比例逐渐增多。上围溪村委书记赵建春说，该村瑶族人数比在山上的时候少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嫁给汉族不回村子的瑶族女子增多了。这种婚姻方面的观念变化是瑶汉双方互动频率加快、互动程度加深引起的。比如，乳源桂头镇的莲塘边，瑶汉两个族群组成的两个村子就只是隔了一条街道，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来往极为密切。这样的结果是瑶族、汉族双方的婚姻圈都扩大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加深，隔阂逐渐消除。

生育观念方面，瑶族移民之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是这对于排瑶和过山瑶来说有着不一样的表现。过山瑶似乎比较愿意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牛塘林场陈宏隆】**原来在板洞龙归寨的时候，公路没有修通，没有计生干部进来，外面已经实行计划生育了，但是我们村子里还是想生就生。但是，现在搬出来了，因为交通解决之后，计生工作方便了，生男生女都得去做手术。我们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没有必要多生孩子。

这是过山瑶的情况。排瑶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要完全达到国家规定计划生育的标准还有个较长的过程。扶轮新村排瑶的计划生育情况大致如下:

**【大麦山镇党委副书记】**扶轮新村现在遵守计划生育的人不到一半,其余的人基本上都超生了,计划生育率仅有40%,并镇之前是计划生育最差的一个村,搬迁下来之后还是有4孩、5孩的情况。有些人为了逃避计划生育,就回到三洲老寨,如果计生人员上去,有狗叫通知,现在也有些人到乳源、怀集或者外逃躲避计划生育,因为瑶胞(指排瑶)还是接受不了纯女户的现实,即使现在交通解决了也不行,观念变化毕竟有个过程。

这与排瑶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有密切关系。过去,排瑶人丁稀少,视妇女多生孩子为荣,生小孩越多的妇女,在社会上越受尊重(连南县志办公室1996:166)。这种观念有着一定的惯性,建国前、建国初就有这种情况。

**【大麦山镇党委副书记】**在建国前,望佳岭村有些汉人有几个老婆,孩子太多,养不了,就送给瑶族。而瑶族之所以愿意接受,是因为他们自己生养的孩子成活率不高,原因是医疗条件较差,接生条件不好。建国初,被划为地主的汉人怕孩子受到影响,就将后代送给瑶人养,虽然不是自己养大,但是孩子毕竟可以长大成人。收养孩子的情况,过山瑶和排瑶都有。新寨村有些人生了孩子之后还要去领养,1980—2005年就收养了约100个的孩子,都没有办理收养手续。三洲瑶胞收养的孩子也有20人左右。瑶胞接受汉族送给的孩子,很高兴,女孩子他们也乐于接受。汉人重男轻女,生了女孩子不愿意带就送给瑶胞收养,因此当地汉人有时吓唬女孩子说:“不听话就把你送给瑶族。”

对于新的环境,孩子们无疑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搬下来后,小孩子见识多,思想也开放了,但是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高岭村】**搬迁以前,条件差,读初中的孩子不多。现在条件好,没想到能读书的孩子更少了。1997年旧村还有4个学生考上大学,但是1998年到现在没有一个考上大学。原因是搬下来之后,接触面广,晚上孩子喜欢去打游戏机、抽烟、赌博等。有一个初中生偷了家里父母亲的1000元,每天都去打游戏机和玩儿。小学毕业以后就有人跑去赌博、看

影碟,这里距离城区才5公里,受到的影响很大。父母亲出去打工谋生,顾不上教育小孩子,这是个大难题。

在消费观念方面,瑶族移民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比如,高岭新村的移民在山上住的时候,家具都是自己砍木料请木工上门来做,而搬下来之后都是到商场去买。连南南岗乡蜈蚣田管理区平时一般每月至少要放一次电影,而有段时间瑶族移民在办喜事时也时兴请电影、请戏。比如,瑶胞邓十八娶媳妇时,就请来电影队到村里放了12场电影,热闹了三个通宵(潘伟1998:102)。办喜事从请喝酒到请电影,这是对新鲜事物的勇敢尝试,也是在新生活环境中的积极调适,从中可以看出瑶族移民的生活追求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他们的消费观念也从追求物质享受提升到了追求精神享受的层次。

#### 4. 3. 2 宗教信仰

粤北瑶族的移民新村在规划时都只是考虑到移民的“属世”的需要,而“属灵”的需要根本就不在考虑范畴,因此搬迁之后,有些移民在新村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寄托之所,于是很多宗教信仰活动都要回到老村进行。这就加强了他们与旧村的联系,增强了他们对旧村的认同,造成了他们“身体”主要在迁入地,而“灵魂”主要在迁出地的有趣现象。

在宗教信仰方面,粤北瑶族搬迁之后也有一个积极的调适过程,因为在新的地方,宗教信仰的某些对象、程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上围溪村赵建春】**在山上有土地庙,大年三十或年初一要去拜。现在的新村在三十和初一也要拜一下,但是没有土地庙,只好在门口摆桌设斋,供奉现居地的土地神和老家的、原来的土地神。

这里,因为搬迁,所拜神灵增加了迁入地的土地神,这是适应新环境而做出的权变。要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搬家,需要将老家的香炉请一个师公选个良辰吉日搬到新家。对于移民来说,他们的根还在老家,他们最为重要的宗教礼仪之一就是回到老家去“拜山”。

**【东莞商会民族村村民】**拜山仪式很重要,大家都回到老家茶坪,每家一两个人就可以。带上香、纸、酒等祭物,鸡不请人时就不用带,吃饭是回家才吃。晚上回到茶坪的老房子里面。平时不拜神,但是逢年过节要烧香。清明节的时候

**要去拜山，届时要在老村住一个晚上。**

在山上住一个晚上，可以同留在老家村子里的故友交流，可以回味关于老家的记忆，可以告慰安息在老家故土上的各位先辈亡灵。现在，由于原有社区和新型社区在空间上的移动，有些流行于迁出地的宗教活动即将寿终正寝，因为在迁入地这些宗教礼仪已经变得有些不合时宜。

**【上围溪村赵建春】旧村有3—5个师公，如果有病就请师公来“跳王”，感谢盘古王，病好之后要“还盘王愿”，届时要花3—5天的时间举行这个仪式。搬下来后还没有搞过，主要是现在交通方便，治疗及时，因此有病时可以直接到医院治病而不用请师公了。**

在山里的时候，就医不便，只有求助于医疗知识更广、“神通”更大的族内知识分子——师公。搬下来之后，师公们在一些方面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现代技术手段代替的命运，因此如果不努力加入新内涵而使之实现及时转移的话，他们发挥所学的空间将会日见其微。

即使搬迁到现代社会中来了，很多粤北瑶族的师公们和珍视瑶族文化遗产的有识之士还是珍藏着作为瑶族传统文化载体的瑶经和各种传世书籍。始兴县上围溪的赵建春、赵凌阳，乳源一六镇旁边的盘胜光、新村的赵新德赵新康兄弟等都藏有一定数量的瑶族宗教古籍（陈晓毅 2004）。有趣的是，这些师公搬了下来，有的还居住在城里，但是当有老家农村的人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乐于回到村里为他们举行仪式，解决问题。城里的生活更加理性化一些，城里瑶族人的宗教需求也没有农村人那么迫切，因而有些师公搬到城里之后就闲下来了，没有什么宗教方面的活儿干，而有的师公则因为名声在外而延请者众。这些师公的心中，家乡的环境才是他们理想的仪式举行之地，因为城市里太过于喧嚣、闹腾，没有那种庄严隆重的宗教氛围。笔者 2004 年底到乳源王茶村调查过山瑶的度戒仪式和到连南泥楼村调查过州堂仪式（其中有个环节就是挂灯）时发现，尽管很多师公都已经搬迁到另外的地方，但是因为宗教仪式的缘故无一例外都回来参加和主持了这个仪式，有些已经移民到广州工作的人和在广州读书的大学生也都请假回家来参加这些仪式，因为这在他们眼里看来是很重要的一种“成人”仪礼。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传统文化如果只能在老家举行，那么随着大量的山民下坝之后，其传承和保护都不可避免地要

出现一些问题。只有在迁入地能够完整地复制他们的宗教仪式，这些移民才能完成“灵”与“肉”的统一，但是这一点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必须要在迁入地建立一些为大家所承认的宗教设施，必须要等移民们重新组合成一个像当初那样“完整”的瑶族社区之后才有可能。当然，在新的环境中，因为不适应而导致生命力逐渐萎缩以至于趋于消失的宗教仪式还是有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关于医疗方面的仪式。

## 5. 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粤北山区瑶族搬迁除了工程、人地矛盾、灾害等原因之外，主要有政治、经济、生态等三方面的原因。事实上，前人的研究已经昭示了这样一种搬迁的趋势。胡耐安 1940 年调查了现在的连南瑶族自治县之后，将粤北瑶族大致分为深山型的“八排瑶族”和过山型的“浅山瑶族”（胡耐安 1974[1964]:222），次年王启澍随中山大学杨成志教授对乳源瑶山的乌坑等处瑶民的经济生活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亦称乳源瑶族“分深山和浅山，浅山较近城”（王启澍 1942:6）。两种瑶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生活在山区，而这一生态环境对粤北瑶族的生活产生着长期的影响。深山瑶选择在山的深处定居、聚居，而过山瑶则选择比较开放的山麓地带散居、暂居，这样来应对人地关系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八排瑶（案：指深山瑶）由于人口增殖的结果，必陷于一种贫困状态”，“过山瑶则依靠频繁开垦新地和迁徙，避免了收益的递减”（竹村卓二 2003:18）。然而，我们知道，早在 1936 年王兴瑞等人随同杨成志教授对曲江、乐昌和乳源交界的荒洞所作的调查报告中就已经说“瑶人农业老早就已有相当发达了”（王兴瑞 1986[1937]:68），其耕田的方法“和汉人相同”（王兴瑞 1986[1937]:71），“狩猎在今日瑶人的经济上，已毫不足轻重了”（王兴瑞 1986[1937]:75），这表明当地的过山瑶也已经农耕化、定居化了。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不堪重负，必然要向周围地区迁移，这个过程事实上在民国和建国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本文论及的粤北瑶族移民点，有两种类型：一是工程移民点（如“牛塘林场”）；二是非工程移民点（如“扶轮瑶族新村”等）。前者开始阶段时曾经得到移民者的拥护，但是当他们的生产生活出现危机时，迁移者就归咎于水库移民工程，因而采取

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不适。后者又有成功和不成功两种类型：移民后土地和其他配套设施齐全的（如沈所镇），迁入地比迁出地更加靠近自己耕地的（如连南高岭），一般都比较成功；移民点只有住房，没有配套土地、猪圈、牛舍、柴草房等其他生产生活设施的，大多不成功，如连山福民新村和立星村。在福民新村和立星村，很多村民因为生产需要而返回旧村耕作和居住，出现了移民“回流”现象和移民点“空心化”现象。因此，实施移民工程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为完成政治任务而草率搬迁：移民前，应该对迁入地的配套设施等进行综合考量，对移民可行性就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面进行全面的人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论证；移民后，要本着人本主义精神，多考虑移民搬迁后的生产生活需要，并对其生产生活进行跟踪调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才能避免移民问题情绪化、扩大化。

粤北瑶族的搬迁经历了两个最为基础的变换：空间变换——从山上到山下，从山地到平川，从石灰岩地区到非石灰岩地区，从高寒山区到低海拔地区；身份变换——从“山民”变为“农民”，从“山民”变为工人，从农民变为“非农”，从农民变为城市居民。与此相伴的是，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经历了物质、社会、精神三个层面很多方面的适应过程。

在物质层面而言，粤北山区瑶族在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方面都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环境的影响，山区瑶族的生计模式主要是一种“山民模式”，生活来源由狩猎、种植（部分为刀耕火种）、采集构成。搬到山下之后，有的成为专门的农民，以种植业为生，其生计模式体现为一种典型的“农民模式”；有的则离开土地，从事第二、第三产业，通过打工挣钱或者自己开店当老板，这就体现为一种“非农模式”。有些粤北山区的瑶族移民，比如沈所镇上围溪民族村的部分瑶民、从连南石灰岩特困山区搬迁到清新县三坑镇明联瑶族新村的大多数瑶胞，在山上的时候他们确实没有耕过田，于是搬迁之后他们成为了“不会耕田的农民”（潘伟 1998:40;44）、因“晕田”（潘伟 1998:40）而不敢贸然下田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有关移民部门安排农业技术人员进行辅导，一方面社会各界捐款购买科学耕田方面的书籍送给移民，但是理论要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本领，一切的包办代替都是行不通的，这还必须通过瑶胞自身对这些生产技能的习得来完成。这个过程就是

瑶胞对新型生产技能、对新型生存空间的一种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瑶胞与当地汉族人形成了一种叫做“驳牛脚”的合作互帮关系：瑶胞为当地人放牛，当地人为瑶胞犁田耙田。这是瑶族移民努力适应新型生产模式，尽快融入迁入地社会的一种表现。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因为不适应迁入地的耕作条件、生活习惯而放弃了改变贫困命运的机会。

在社会适应层面而言，虽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但是从社会结构层面看，粤北瑶族社会仍然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费孝通（1985:26）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血缘、地缘关系对这一社会起着支配作用。但是，当初级社会关系遭到破坏之后，自愿性瑶族移民的适应性要强于非自愿性移民，这主要体现在面对搬迁后出现的风险的抵御能力方面，毕竟那些自愿移民还有自己的故土可以回头，可以疗治在搬迁中遭受的各种“伤痛”。社会角色是与人的社会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行为模式，是构成社会群体的基础。搬迁常常导致迁移者社会角色发生转变，而社会角色转变的成功与否，也就标志着移民工程的成功与否（李华、蒋华林 2002）。当板洞水库的移民从农民角色转变到“非农”角色，进入农场、电站、工厂工作的时候，自然也曾经体会到“吃商品粮”、“旱涝保收”等摆脱“农门”的喜悦，但是在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下岗工人、“待业”青年等负面的社会角色时，这一转换过程出现了问题，有些移民开始怀念自己作为农民时“有田有地”的田园生活，因而向政府提出要到连南大麦山镇西南的菜坑去开垦的强烈要求（连南县板洞食水工程管理局 2005）。

在精神层面而言，粤北瑶族移民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某些方面已经经历了比较明显的适应过程，有些方面正处于调适过程中。随着瑶汉民族居住地从聚居为主的状态走向杂居为主的状态，瑶汉族群的互动程度随之加深，互动频率也随之加快，这带来了他们婚育观念、消费观念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迁入地与迁出地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使得这些传统仪式面临着一定的调适问题，很多传统的瑶族宗教仪式都没有在新居地举行，而是回到迁出地去举行。粤北瑶族移民神台的书写格式部分采纳了当地汉族家庭神台的书写格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粤北瑶族移民宗教信仰的进一步汉化趋势。

应该指出，粤北石灰岩地区、高寒山区瑶族的搬迁，大部分是有着搬迁愿望的，有的人甚至在政府确定搬迁之前很长时

间就已经先行搬迁出来了。对于他们来说，政府的移民搬迁乃是雪中送炭。比如：

**【东莞商会民族村赵锦辉】**我家原来住在东坪镇茶坪村五组。我1995年冬季从茶坪村搬到附城镇（即现在的“乳城镇”的龙王潭，租房租地，自谋生路。2004年8月份开始搬到民族村，每户自己出10000元，其余由商会出资。这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没人帮忙，他们也会将搬迁进行到底，有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当然乐享其成。然而，对于水库移民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来没有迁走的意愿，但是为了国家或集体的更大利益而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也许，这就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移民在搬迁之后经历的迥然不同的适应过程埋下了伏笔。

石灰岩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举家搬迁，是进行异地开发脱贫致富的一项有效措施，较好地解决了他们长期以来难以脱贫的问题，为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言而喻有着极为重要的投资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王安忠 1998）。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移民安置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为移民多考虑今后的生产、生活问题，使移民搬得进、住得稳。在发展生产方面，移民部门派出干部根据实际情况帮助移民规划生产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尽量改变山上那种重视农作物，轻视经济作物的习惯，使移民新区的生产布局趋于科学合理，改变从前单一靠山吃山的生计模式，实现经济来源的多元化，从而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在技术扶持上，政府有关部门派出了专职的蚕桑技术员、农业技术员，负责移民的生产指导工作，通过举办培训班、上农业技术课、召开现场会等传授水稻、花生、蚕桑等方面的种养技术，并手把手地教练，使移民较好地掌握有关知识、技术，从而更快地适应山下的生产模式。作为一种灵活机动的赚钱方式，打工在移民的经济来源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有的地方还占有很重要的比例。这些都起到了让瑶族移民尽快适应新型生计模式的作用。近城农民洗脚上岸，山民租田种地，填补农田耕作劳力的空缺，这显示出汉族和瑶族、经济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对于现代社会适应程度的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的梯级递补现象。

俗语云“山性使人隔”，以前粤北一些山村的报纸要七天之后才能收到。交通不便，粤北山区瑶族走出十八弯的山路总是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体力，因而与外界接触寡少；教育设施落后，教育程度低下，很多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在家，使得山区瑶族盲目地认为山外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从而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遇；对于外面的繁华而陌生的世界，由于了解不多，心向往之而力有不逮，因而他们不愿也不敢到外面闯荡。这就造成了他们只懂伐林砍树养蜂猎鼠的“山民模式”的谋生手段，只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驰骋而缺乏走向外部世界的勇气、信心和动力，从而不能习得更多在现代社会立足的谋生技能。这种技能的欠缺，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与现代社会的距离，最终又只能通过有意识地“封闭”自身来达到对自我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组织、社会各界支持的这一搬迁行为，给了粤北山区瑶族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良好机会，给了他们走出大山、接受现代社会洗礼并最终成为整个市场经济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良好契机。因为各种原因而重新组合聚居的移民新村，比起传统的村庄来，更具开放性，更适应现代社会。粤北瑶族的村庄，是相对独立的社区，一般都有着浓厚的民族传统。这些村庄与现代社会相比，存在着诸多不适应的方面，比如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权力秩序和管理秩序以辈份、宗教神权、习惯法为基础，通婚范围狭窄，等等。搬迁之后，移民来自不同的村庄，这打破了传统瑶族村庄的某些血缘、地缘关系格局，并使之更具有现代特征。在短暂的阵痛之后，这些移民和他们组成的村庄必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竞争。

#### 注释

- (1) 瑶族不是广东土著，自南朝末年之后由湖南进入粤北，逐步发展而成今日之模样，为了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后大批涌入广东珠三角城市的瑶族，因而称为“世居瑶族”。
- (2) 下载自 [http://www.mzzjw.gd.gov.cn/acms/export/big5/gds\\_smz/sjssmz/yz/index.html](http://www.mzzjw.gd.gov.cn/acms/export/big5/gds_smz/sjssmz/yz/index.html)（广东民族宗教网），2005年9月23日。
- (3) 下载自 <http://www.qy.gd.cn/gov/qingyuan.htm>（“清远市人民政府”网站），2005年9月20日。

### 参考文献

- 陈阿江·施国庆·吴宗法 2000《非志愿移民的社会整合研究》，《江苏社会科学》(6):81-85。
- 陈夏春(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处) 2003《关于民族地区移民情况的调研报告》，未刊稿。
- 陈晓毅 2004《乳源瑶族调查报告》，《广东民族研究通讯》(34):22-31。
- 程瑜 2004《一个三峡移民村落广东的生活适应》，中山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
- 顾宝炎·彭志刚·牟庆荣·劉中露·賈振強 1999《粤北山区经济发展投资切入点研究》，《南方经济》第2—3期, pp. 64-66。
- 胡耐安 1974[1964]《中国民族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黄朝中·刘耀荃 主编，李默 校补 1984《广东瑶族历史资料》，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黄朝中·吕燕华 1986[1951]《粤北瑶族的经济生活形态》，原文刊载于《社会经济研究》(第一期)，广州：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 pp. 251-277，本文参考刘耀荃、李默 编《乳源瑶族调查资料》，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 pp. 392-426。
- 李华·蒋华林 2002《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的社会角色转换》，《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60-63。
- 连南县板洞水库食水工程管理局 2005《板洞水库移民目前的生活现状及今后发展的初步设想》，内部调研报告。
- 连南县志办公室 1996《连南瑶族自治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 1992《排瑶历史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练铭志、马建钊、朱洪 2004《广东民族关系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凌伟建(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工作处) 2005《广东少数民族移民搬迁工作情况调研报告》，未刊稿。
- [美]迈克尔·M·塞尼 2000《社会整合与人口迁移：社会科学的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pp. 295-334。英语原文出版信息为：Cerny, Michael M. 1995.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opulation Displacement: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43:1:91-112.
- 潘伟 1998《走出“寒极”——粤西北十八万山民大迁移现场笔记》，广州：花城出版社。
- 施国庆·陈阿江 1999《工程移民中的社会学问题探讨》，《河海大学学报》(1):23-28。
- 始兴县贫困瑶区移民安置办公室 2004《始兴县瑶区移民安置工作情况的报告》，内部资料。
- 王安忠 1998《宁夏南部山区移民吊庄模式和经济效益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40-44。
- 王启澍 1983/1943《粤北乳源瑶民的经济生活》，《民俗》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上海：上海书店影印, pp. 6—15。
- 王兴瑞 1986[1937]《广东北江瑶人的经济社会》，原文刊载于《民俗》第一卷第三期《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本文参考刘耀荃、李默 编《乳源瑶族调查资料》，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内部资料, : 64—125。
- 许文清 2002《粤北瑶族研究》，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
- 张小军 1998《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二十一世纪》(45):150-159。
- [日]竹村卓二 著，金少萍、朱桂昌 译 2003《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